
现代日本的民族主义

[日] 米原谦 崔世广译

内容提要: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日本的民族主义开始摆脱战败和对美从属的劣等感,形成了“现代”的形态。80年代,日本的民族主义从战后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经济增长的国家目标和要求承担相应国际贡献的国际压力的反差,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争论点。冷战结束后,冷战尘封起来的“历史问题”作为“战后赔偿”问题喷发出来,由于日本政治家和知识分子过去很少面对这种问题,因而受到了东亚各国的严厉批判。但以慰安妇问题等为契机,谢罪问题被扩大化,又引起了右派媒体的反动,在民众层次上也出现了战后日本从未经历过的激进民族主义,而石原慎太郎与安倍晋三等为代表的右翼政治家也因此得到了大众的支持。

关键词:日本民族主义 国际贡献 历史问题

作者简介:米原谦,日本大阪大学国际公共政策研究科教授。

译者简介:崔世广,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D7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874(2013)03-0023-18

从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到1973年的石油危机,日本实现了惊人的经济增长,同时,社会状况也发生了急速的变化。产业化引起了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大规模迁移,导致农村过疏化和城市过密化,使原来的社会网络崩溃,在政治方面无党派层急剧增加。从1960年到1970年,自民党与社会党的议席不断减少,公明党与共产党的议席则以大城市为中心出现了大幅增长。由自民党、社会党两党分割议席意义上的“1955年体制”发生了切实的变化,城市中间层开始对政党政治的走向产生巨大影响。

如果聚焦于民族主义,那么1960年反安保条约斗争可以说是“革新”阵营反美民族主义的顶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统治精英们,将以占领下的天皇制存续下去即维护国体作为最优先课题,并为此做出了

与“昨天的敌人”美国相妥协的选择。以旧金山媾和与日美安保为基本构架的吉田路线是最明显的证明，“保守”阵营由此丧失了树立民族主义的资格，“革新”阵营则成为了民族主义的承担者，而 1960 年的安保斗争可谓其总决算。

岸信介想与吉田路线划清界限，但在以日美协调为基点上，并非要转换战后政治方向。想在安保条约中给日本一定自主性的岸信介，毋宁说确立了其后将日美同盟作为基轴的自民党的外交和防卫政策。由此，围绕日美安保的保守与革新的对立变得明确起来，但高速增长以后，革新阵营已不能以反对日美安保为借口来动员民族主义（只有美军基地集中、长期处于美军占领下的冲绳是个例外）。在 20 世纪 60 年代后半期发生的“越平联”（“给越南和平！市民联合”）和新左翼学生运动，反美和民族主义已经不是起爆剂。

1970 年以后，由于以前并不引人注目的右翼势力的出现，民族主义的倾向具有了新的特征。1970 年 11 月，三岛由纪夫与“盾之会”的成员闯进自卫队驻地自杀，这是由针对 1970 年围绕安保出现的激进左翼运动的危机感而引发的。1972 年，日中实现了邦交正常化，出现了日中空前友好的气氛。1973 年 7 月，自民党内结成了青年政治家集团——“青岚会”。其政策目标是：（1）与自由主义阵营展开合作；（2）批判物质万能的风潮，使教育正常化；（3）纠正财富的偏差；（4）制定自主独立的宪法。其中心人物是渡边美智雄、中川一郎、石原慎太郎等，成员多属福田派和中曾根派。虽然他们的活动不能马上左右保守政治的走向，但表明在战后保守派政治家中，存在在宪法、教育等方面否定战后价值观的势力。这是保守阵营中新民族主义生成的划时代性事件，80 年代以后开始以明确的姿态出现。

一 “国际化”时代的民族主义

20 世纪 70 年代后半期开始，日本被明确赋予“经济大国”的特征。由于 1971 年的所谓美元冲击，汇率由对美元固定制变成了浮动制。这意味着不仅商品，就是资本交易也被国际市场所支配。进而，因为 1973 年的石油冲击，发达国家全都进入了低增长（或负增长）时期。虽然日本

经济也不例外，但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日本很快恢复过来，其经济实力在国际社会急速上升。这样，“国际化”与“经济大国化”的状况结合在一起，改变了日本的舆论，进而使日本的民族主义出现了新的特征。

（一）“町人国家”

信息、金钱、物资和人员，以过去无法想象的速度自由跨越国境开始流动。虽然“国际化”带来的环境变化对哪个国家都是一样的，但对日本似乎带来了特别大的冲击。这是因为，由于经济大国化带来的国际影响力增大与上述意义上的“国际化”几乎同时进行，日本人的言论行动以超出其自觉的程度受到世界关注。1986年9月，中曾根康弘首相相对黑人和美国拉美裔移民的歧视发言，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连特别重视日本在国际社会的作用和政治家领导能力的中曾根，也没有认识到自己发言产生的国际影响。甚至不管住在多么偏僻地方的日本人，也不能避免汇率变动带来的影响。反过来也可以说，每个日本人的经济活动，不管愿意与否都会给其他国家和个人带来某种影响。

所谓“町人国家”，是对战后的日本国家赋予否定性特征的用语。最初使用这个词的，或许是天谷直弘的《“町人国家日本”商人的赘言》。在1979年11月美国驻伊朗大使馆发生人质事件时，日本出于确保石油进口的考虑，犹豫于对美国的协调，进而在美国刚发表禁止伊朗石油输出措施之后，日本企业还做出了花高价购买的举动等。天谷当时担任通产省的审议官，这篇论文就是基于为此善后措施而奔走的经验写成的。

按照天谷的说法，国际社会是“半原始森林”，日本则好似“近似肥胖的兔子”。所以，“町人”为了在“武士社会”实现繁荣，必须具有“卓越的信息收集能力、构想能力、直感能力、外交能力，有时还要具有奉承能力”，但日本人欠缺对国际社会认真的思考。天谷主张，应该更好地贯彻“町人道”，但他在这篇文章的末尾预测说，日本不可能永远都做“町人国家”。^①

在“町人国家”这种卑下的表现中，也可以察觉外交当局者的实际感受。松冈英夫的《提倡“晚乘车”的外交》一文，就从与天谷稍许不同的角度来论述石油冲击后日本在外交上走钢丝的状态。松冈认

^① 天谷直弘「『町人国・日本』手代のくりごと」、『文藝春秋』1980年3月号。

为,对日本来说的现实主义外交应是这样的:日本是无资源的国家,所以首先必须与任何国家都保持友好关系,为了遵守这个原则,重要的是不接近纷争。日本从石油冲击中学到了三个教训:(1)日本对世界哪个国家、哪个地区都不能是无知的;(2)不帮助纷争当事者中的任何一方;(3)在国际纷争中,不被美国牵着鼻子走。特别是关于第二点,主张应对纷争的态度应该是“神经质”,或者“赶不上公交车”,或在无论如何也必须乘车的时候,乘坐“末班车”。^①

关于日本外交所处的环境,尽管天谷与松冈的评价有些许不同,但表达了大体相同的认识。而左濂昌盛的《排除“町人国家”论》一文,则对两者进行了批判:(1)指出“町人国家”的比喻不确切,认为今天的国际社会与德川时代的身份制社会不同,没有实行“刀狩”(没收刀具),任何国家都是士与农工商兼顾;(2)“专职町人”只不过是“一厢情愿”,并没有为世界所认可;(3)日本也不是“赤手空拳”,而是有自卫队和《日美安全条约》。所以,左濂主张,应该给这些“权力的要素”以“正当的待遇”。在这里,可以看到以后出现的“正常国家”论的萌芽。^②

(二)“正常国家”论

在围绕“町人国家”的争论中,可以察觉到与以前明显不同的言论状况。这是与日本在国际社会中位置的变化相对应的。二战后日本致力于实现“富裕的社会”,一直注意不卷入国际纷争。但是,无论谁都开始认识到,不允许那种尽量不介入国际问题的消极姿态的时代已经到来了。换句话说,日本这一国家的存在方式作为政治的主题被提了出来。

这也在给 20 世纪 80 年代政治确立框架的“第二次临时行政调查会”(第二临调)的报告中得到了体现。在 1981 年 6 月提出的“第一专门部会中期报告”中,作为通过行政改革致力于“建设国家的基本方向”,提出了“实现有活力的福祉社会”与“对国际社会的和平贡献”。由于“临调”关心的主要是内政方面的改革,国际贡献方面没有受到多大关注,但此后“和平贡献”一词变为“积极贡献”,成了“临

① 松岡英夫「『乗りおくれ』外交のすすめ」、『中央公論』1980 年 3 月号。

② 佐瀬昌盛「『町人国家』論を排す」、『文藝春秋』1980 年 4 月号。

调”所描绘的国家形象的基轴。在1982年5月的“第一部会报告”中，作为“对国际社会的积极贡献”，提出了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各国的协调关系，保证资源、能源和粮食安全供给的经济安全保障，整備与国力、国情相符的防卫力量。这是被称做“综合安全保障”的思考方式，即在强调作为“西方的一员”作用的同时，对因贸易摩擦而激化了的美国要求日本增强防卫力量做出的回应。

1982年末就任首相的中曾根康弘一边将“国际贡献”这种外压作为助推力，一边想从战后政治的框架中大胆向前跨出一步。中曾根虽然被媒体揶揄为“墙头草”，但其从1947年选举中投身保守政界以来，拥有作为民族主义者一贯的东西。他从早期就与吉田路线唱反调，在内心中对1951年的《日美安全条约》也是反对的。批判对美国的从属和主张基于修改宪法的自主防卫，可以说一直都是中曾根政治理念的核心。但他在就任首相时，承认了以自由和和平为基调的宪法、《旧金山和约》和《日美安全条约》是战后日本繁荣的基础。在外交安保政策方面坚持日美同盟第一主义，已经成为难以动摇的东西。

中曾根在就任后闪电式地访问了韩国，解决了产生纠纷的经济援助问题，接着访问美国，构筑了与里根总统的个人信赖关系。在《华盛顿邮报》的采访中，他提出有事之际“封锁四个海峡”和“将日本列岛变成不沉的航空母舰”等，这样的言论传到日本后，使其支持率一下子下降了。这也表明了中曾根在日美关系方面，主张日本在军事上也要发挥积极作用的志向。中曾根内阁的外交姿态与这样的理念是一致的，在1984年版的《外交蓝皮书》中，就加上了“对世界和平与繁荣积极做出贡献的外交”这样的副标题。而且，始于1978年的美军驻留经费负担，到80年代也呈现了惊人的增长趋势。

但是，中曾根“不沉航母”的言论，使人联想到清水几太郎的《日本应该成为一个国家——核武器的选择》。清水是20世纪50年代和平运动的旗手，在1960年安保斗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而广为人知。但其后远离了大众运动，70年代后半期发表了多篇论文（收录于《怀疑战后》，1980年出版），表明了与战后价值观的诀别。他认为，战后价值观不过是将战前没有特别视为问题的现象（如治安维持法和教育敕语），按照共产国际、共产党的观点加以夸大并被视为罪恶而加以批判。在思考1960年

以后清水所走过的道路时，不能排除在反安保斗争的挫折中所产生的对共产党及其同伴知识分子的敌意。也就是说，曾是 50 年代和平运动原动力的反美民族主义，其后在清水那里发生了方向转换，变成了对共产主义及苏联的敌意，作为保守的反共民族主义而出现。

在《日本应该成为一个国家》一书中，清水批判战后日本回避对国家来说不可缺少的军事侧面，而只致力于经济增长。这本书的后半部分题为“日本应拥有的防卫力量”，是以清水为中心的军事科学研究的成果。清水最初不惜自费出版该书，送给防卫厅有关人员等，由于获得好评，其后全文登载在《诸君》杂志上，最后由文艺春秋社公开出版。该书基于 70 年代后半期以后美苏的军事平衡变为苏联占优势这样的认识，具体论述了为对抗苏联侵略日本应该拥有怎样的军事力量。该书认为，在苏联处于军事优势的状况下，美国的核保护伞是靠不住的，拥有能独自对抗苏联入侵的军事力量，不仅对日本而且对美国 and 西方国家也是有益的。^① 可以想见，在中曾根发言的背景中就有着这样的思想动向。

但是，1985 年 8 月 15 日，中曾根在做了周到的准备之后，作为首相首次正式参拜了靖国神社。虽然是以 1975 年三木武夫首相以来历届首相参拜为先例的，但中曾根采取了正式参拜的形式，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中曾根拥有作为海军士官的从军经历，虽然可以想象其个人有着对战死者的感情，但正式参拜靖国神社鲜明地表明了与传统右翼的联系。这引起了日本国内宗教界有关人士及韩国、中国的超乎预料的反对，中曾根又感受到了与舆论的巨大反差。

中曾根在美军占领时期曾组织农民向地方占领军当局游行示威过，拥有作为大众迎合主义者的一面。他在占领结束后不久开始提倡首相公选制度，也可以说是基于同样的想法。如果时代更早的话，以中曾根所具有的思想和体质，即便是作为皇道派来活动也没有什么不可思议。但是，这样的倾向，说到底不过是中曾根政治姿态的一个方面。如前述的三岛由纪夫闯入自卫队自杀事件，尽管发生在中曾根任防卫厅长官时，但他对三岛事件持明确反对态度。作为首相的中曾根在因“不沉航母”发言而受到批判后，掩藏起作为鹰派的本色，参拜靖国神社也因为中

^① 清水幾太郎『日本よ国家たれ一核の選択一』、文艺春秋社、1980 年。

国、韩国的批判而彻底放弃。

中曾根虽然是以国家利益为第一要义的国家主义者，但不是盲目的民族主义者。即便有时做大胆的发言和表演，但不会错误判断形势。在石油冲击后的日本，洋溢着自我陶醉的气氛。与其他发达国家停滞的经济相比，日本经济的状况良好，“日本式经营”的优秀性受到追捧。中曾根在国际舞台的亮丽表演，是与这样的自我肯定性的社会气氛相一致的，也撩拨起了国民的自负心。

这个时代的保守舆论，从被叫做“生活保守主义”也可以看出，并不是基于意识形态的保守理念的东西。中曾根不时地让人看到作为鹰派的本性，但在暧昧的自我肯定的民族主义风潮中维持了高支持率。支持其的核心，是拥有比较高的学历、对当时的生活状况相对满足的城市居民，村上泰亮将其用“新中间大众”这一全新的名称来称呼。他们是私生活中心主义者，主要关心消费和余暇，对于公共的问题基本是依靠行政的力量。虽然对政治不抱有强烈关心，但对自己的利益非常敏感，在价格下调等有利于消费者的范围内赞成中曾根行政改革，但反对增收消费税等政策。他们认识到自己的生活环境并没有坚固的基础，因而对威胁到这些东西会产生敏感反应。即在维持生活现状这一点上是保守的，但也不赞同变革现状的右翼思想。虽然与以前的时代相比，80年代民族主义色彩更为浓厚，但仍顽强地保留着中曾根和清水视为问题的“战后政治”的制约，与他们所追求的“正常国家”还有距离。

（三）海湾战争

1991年的海湾战争，是对成为根本改变战后和平主义的一种冲击。日本为多国部队提供了总额达130亿美元的资金，但在被解放的科威特的感谢信中并没有提到日本，对此，日本政治精英们感到了深深的挫败感。小泽一郎对这种状况做出了最快的反应，完成了自民党“关于日本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特别调查会”（“小泽调查会”）报告书。报告书否定以前以不卷入战争为根本的“一国和平主义的思考方式”，主张在安全保障方面也要分担责任的“积极的、能动的和平主义”。其背景中有着这样的判断：冷战后的国际秩序是日美欧三极或构成这三极的七国集团的“集体领导体制”，日本必须在这样的体制中承担新的作用。因此，强调以下四点作为日本的对应：日美基轴关系、强化与七国集团的

合作、积极参与联合国的活动和合作、作为亚洲的一员而努力。

在该报告书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后两点。首先，针对参加联合国的活动，提出了在推进缩减军备、对维持和平活动的合作、强化联合国的作用和加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外，还要参加联合国部队。虽然其解释说参加联合国部队是基于国际决议的协调性活动，与宪法第九条并不抵触，与行使集体自卫权也不一样，但这样的解释还是大大超越了以前政府的解释。其次，关于多国部队，也主张不仅在资金、物资方面，就是在医疗、运输、环境保护等方面也应该进行人员方面的协作。而实现这些的前提，则是确立国内政治的领导力、整備有事法制等、获得其他国家的理解。这个报告书的基本认识是，关于日本在安全保障方面发挥作用，“还没有获得近邻亚洲各国充分的理解和信赖”。^①

不用说，小泽调查会的想法后来被新生党以及新进党所继承。在获得高度评价的《日本改造计划》中，小泽建议将自卫队作为联合国预备队来提供。而且，为了使其与宪法第九条的关系变得明晰，提议或者在第九条中新设第三项，将保有自卫队和联合国预备队明文化，或者制定拥有同样规定的和平安全保障基本法。关于作为亚洲一员的日本的位置，该书也做出了比前面的报告书更进一步的表态。为了对亚洲各国承认“侵略责任”，以打消对日本的不信任感和警戒心，他提出了三个建议：“诚实地处理侵略所带来的未解决问题”；确认过去曾经有过与亚洲“共生的动向”，创造以此为目标的外交理念；一边与各国协商，一边明确日本的责任与作用。^② 他虽然没有提出战后处理的具体方法，但所谓“诚实处理”应该与必须有某种形式的补偿相关联。如后所述，细川内阁做出了承认“侵略战争”的表态，在这个问题上前进了一步，而其背景中就有着这样的认识。

二 “历史认识”与民族主义

20 世纪 90 年代后半期以后，围绕“历史问题”的争论迅速升温。

① 国際社会における日本の役割に関する特別調査会「国際社会における日本の役割—安全保障問題に関する提言—」、1992 年 2 月 3 日。

② 小沢一郎『日本改造計画』、講談社、1993 年、151～152 頁。

这实际上不单是关于日本战争行为的认识问题，还包含着谢罪这一具体的政治、伦理的争论，所以激起了日本的民族主义。由此，生成了与80年代暧昧的自我肯定的民族主义根本不同的民族主义。以前，像林房雄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那样对“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后的战争表示肯定的言论，被看做是例外的、特殊的议论。就连被视为鹰派的中曾根首相，也明确表示与美英的战争是自卫战争，但对中国的战争是侵略行为。也就是说，把15年战争区分为两个战争，认为对美英的战争是帝国主义国家间的战争，那是不得已的。虽然像中曾根那样承认“侵略”的鹰派政治家和言论人是个例外，但从正面主张是“解放亚洲”的战争的人也很少见。

90年代后半期以后开始高涨的民族主义，已经不是中曾根时代那样的“温柔”的自我肯定。他们将近代日本的全部战争视为当然的自卫行为，将战争中的死者作为“英灵”加以赞美。而且，全面肯定“大东亚战争”的口号，激烈批判对“解放亚洲”这一战争的“大义名分”持否定态度的事物。令人瞠目的是，这并不仅仅是一部分知识分子的言论，而是作为草根运动展开的。这样过激的民族主义倾向，为什么会在社会底层开始萌芽呢？

（一）“战后赔偿”问题

1977年，原中国台湾籍日本士兵提起了要求补偿的诉讼。1982年，日本改变教科书记述引起韩国、中国的反对，从而成为国际问题。在1951年缔结的《旧金山和约》第14条a项中，有关于赔偿义务的规定。但这是以日本“经济的可存立”为前提的，其结果是赔偿对日本来说是非常轻的。因日本发动战争而受害的亚洲的许多国家，不得不因为美国的远东政策而放弃了要求赔偿的权利。

这样，日本的战后复兴虽然也是得益于冷战的恩惠，但到80年代以后其欠账开始显现出来。在民主化之后的韩国和拥有了经济实力的亚洲各国，其对日关系在80年代以后发生了微妙变化。因冷战的崩溃，以《旧金山和约》为前提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在挪开了冷战结构这块巨石以后，长期被封锁的东西喷发出来了。其最初的动向，就是1982年围绕历史教科书问题韩国、中国对日本的批判。此时的铃木善幸内阁，发表了官房长官谈话，表示在教科书审定上要重视促进与近邻各国

的相互理解与友好合作，才使纷争告一段落。但是，由于冷战崩溃这一国际形势的急速变化，日本国内政治结构也开始发生变化，从左右两个方面出现了重新看待战后政治的动向。

继教科书问题之后，在日中韩三国间引起很大纷争的是“慰安妇”问题。1991 年，原来做过“慰安妇”的韩国女性，提出了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和补偿的诉讼。之后不久，访韩的宫泽喜一首相，公开就慰安妇问题道歉，并承诺究明真相。1993 年 8 月，“河野官房长官谈话”发表，公布了调查结果，承认了日本军队参与慰安所的设立经营，并对伤害了“许多女性的名誉和尊严”谢罪。这个谈话，是在因自民党分裂大选失败，宫泽内阁总辞职前一天发表的。继任的非自民党联合政权的细川首相，在刚当选后的就职演说中，也对日本的“侵略行为和殖民统治”表示“深刻反省和道歉”。这里面蕴含着想与亚洲各国构筑新的关系，基于小泽一郎等的“正常国家”论，在冷战后的国际社会发挥积极作用的心理诉求。

但是，事态却向着意外的方向发展。非自民党的联合政权由于十分脆弱而崩溃，当自民、社会 and 先驱新党三党联合政权成立后，1995 年 8 月 15 日，村山富市首相发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50 周年的“首相谈话”，就殖民统治和侵略给“亚洲各国的人们带来的巨大损害和痛苦”，表示“痛切反省之意”和“由衷的道歉”。在这之前，作为对“慰安妇”进行补偿的基金，村山内阁成立了亚洲女性基金（正式名称是“为了女性的亚洲和平国民基金”），采取了将“河野谈话”具体化的方策。

这一连串的举动，引起了民族主义分子方面的反对。例如，针对与德国比较指出日本的战后处理非常不充分的议论，西尾干二在《不同的悲剧：日本与德国》（1994 年）中，极力反对将日本和德国放在同一平面进行比较。按照西尾的说法，两者存在以下四点不同，从而强调了德国的特殊性：（1）其是“‘党’主导的国家形态”；（2）在其根底有着生物学的人种思想；（3）无视政治、军事利益而大量杀人；（4）战争很难说是为了保卫国家。而在日本，则与以恐怖主义为本质的独裁主义没有关系，也没有纳粹那样的优生学的人种思想。关于第三点，虽然有石井部队那样的例子，但“作为整体来考虑，日本是进行了普通的战争”。而关于第四点，德国纳粹的行为特征是“能动的”“攻击性”，

难以从保卫国家的观点加以正当化，而日本的大陆侵略则是模仿欧美的“被动的攻击性”。

但是，不能说日本人的战争犯罪比纳粹德国轻就没有必要谢罪和补偿，这是不言自明的。西尾将日本和德国战争加害的量的差异偷换成质的差异，进而想主张日本的战争是正当的。

（二）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

1996年，西尾与东京大学教育学部教授藤冈信胜出版了合著《国民的疏忽》，对文部省审查通过的七种历史教科书的近现代史记述展开了批判。藤冈信胜出生于1943年，其政治立场似乎以海湾战争为契机发生了急剧变化。他公开宣布自己“在朴素信仰宪法第九条的理想主义这一点上，不过是极为标准的教育研究者”^①。但由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崩溃，他认为应该走向改变关于日本近代的“黑暗史观”、“自虐史观”的道路。从1994年开始，藤冈将这样的想法用两年时间在明治图书出版社的教育杂志《社会科教育》上连载，然后正式出版。

藤冈在该书中将左翼的“东京审判史观”与右翼的“大东亚战争肯定史观”一起加以否定，而提倡“自由主义史观”。藤冈赞成肯定日俄战争以前的战争为“保卫祖国的战争”，以与昭和时代的战争相区分的思考方式，这种思考方式的代表则是司马辽太郎的《坡上的云》。藤冈之所以将其叫做“自由主义史观”，是因为司马史观的特征是“不为任何意识形态所束缚的、灵活公平的看法”^②。藤冈指出，司马史观有四个特征，即“健康的民族主义”、“现实主义（技术合理性）”、“对意识形态的强烈不信任”和“批判官僚主义”。值得注意的是，这时的藤冈对“历史本来是民族的”看法持否定态度，主张应将“他者的存在”纳入视野。我们认为，稍后的藤冈也并不认同这种看法。

藤冈在这里所显示的历史观有点过于外行，如果是历史研究者，都不会有兴趣进行真正的批评。总之，藤冈这时的主张，不过是政治外行的教育学者，对拥有强烈政治意识的日本教职员工会（日教组）和战后历史学持有朴素反感的表现。但是，这种质朴的对战后历史范式的怀

① 藤岡信勝『近現代史教育の改革—善玉・悪玉史観を超えて—』、明治図書、1996年、あとがき。

② 同上书，第99页。

疑,在其后围绕“慰安妇”与靖国神社问题的民族主义的波涛中,却急速地具有了战斗性。成为其核心的,则是“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和“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的相关活动。

在与西尾合著的《国民的不动》中,藤冈将历史教科书的记述特征归纳为属于“冷战时期超级大国对日敌意结晶”^①的“东京审判史观”和“共产国际史观”,加之 1982 年以来的“谢罪外交”史观,对其展开了激烈批判。另一方面,西尾则指出,日本人对历史中的虚构与真实的微妙关系是缺乏自觉的。按照他的说法,政治语言经常具有虚构的要素,虽然日本在战争中“解放亚洲”的口号“一半谎言一半真实”,但英美所提倡的自由主义和民族自决、门户开放等也是这样的。他批判说,战后日本把日本在战争中所提倡的大义名分全作为假话,而将美英方面的大义都当做了真实。

战后启蒙主义以及司马辽太郎认为,日清战争(甲午中日战争)、日俄战争中的民族主义是健康的,但往后的日本则堕落了。另外,竹内好与中曾根康弘认为,日本对亚洲各国的战争是侵略,但对美英的战争是自卫行为。虽然方法不同,但都是在某个地方将历史的联系一分为二,把一边作为善、另一边作为恶加以评判。藤冈当初主张的自由主义史观,在本质上也与这些相同。西尾否定这样的思考方法,主张不应事后诸葛亮式地评判本国历史,而应原原本本地接受。所谓“人的生存就是接受命运。未来是不可预知的,反省过去也没用”^②就是这个意思。虽然藤冈对此没做什么表示,但“自由主义史观”已经开始变质了。

1997 年 1 月,以西尾和藤冈为中心结成了“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简称“编撰会”)。从 1992 年到 1993 年,日本政府发表了加藤官房长官谈话与河野谈话,受其影响,历史教科书中出现了关于“慰安妇”的记述。“编撰会”是作为其反对的一面而结成的。“编撰会”在全国建立支部,以该会为中心发行的《国民的历史》(1999 年出版)创造了空前的销售纪录。以西尾干二为执笔代表出版的《新历史教科书》(扶桑社出版),2001 年通过了文部省审查(与此同时,同一系列的

① 西尾幹二・藤岡信勝『国民の油断—歴史教科書が危ない!—』、PHP 研究所、1996 年、220 頁。

② 西尾幹二『国民の歴史』、産経新聞ニュースサービス、1999 年、615 頁。

《新公民教科书》也通过审查)。在该书的开头,主张学习历史就是“学习以往人们对以往的事实是怎样思考的”,应该废除以现在的善恶标准来评判历史。^①

不用说,使用“大东亚战争”这样的表述,以及强调1943年大东亚会议的意义等,在该教科书的近代史记述中鲜明地体现了“编撰会”的思想,即历史的记述方法因民族而异是当然的。基于由历史教科书来创作“国民的故事”的意图,事实上,该书用几页的篇幅介绍了神武天皇东征和日本武尊的传说,还主张神话与传说是了解古代人想法的“文化遗产”,用四页的篇幅介绍了《古事记》神代卷的内容。

(三) 反美民族主义的狭路——小林善纪的《战争论》

以历史教科书问题为契机,日本的舆论明显右倾化了。同一时期,在年轻人中受到狂热追捧的,是小林善纪的《新傲慢主义宣言 战争论》(全三册,1998年、2001年、2003年出版)。包括“慰安妇”问题、“南京事件”等话题,小林关于日本近代战争的认识与表述,都沿袭了“编撰会”的主张。但是,通过三册《战争论》所表现出的基本思想,是对现代日本人欠缺“公共性”的愤慨。例如,在《战争论》中,其展开了如下关于“公”的主张:在任何人的心中,都同时存在着“只有自我的个人”和“有公共心的个人”,虽然欧美国家“个人”的观念很强,但对国家与共同体的归属感也很强,国家、民族、宗教、传统、家庭等意识支撑着“个人”;但是在日本,进步文化人提倡“个人而非国家”,其结果是“只有自我的个人”大肆蔓延开来。针对这样的风潮,小林提出“个人”与“公”不是对立的,正是日本人丧失的“公”的意识支撑着个人。

从这样的观点出发,小林表现出对志愿参加特攻队的青年的强烈共鸣。例如,在《战争论3》中,与特攻队相关联,小林这样说道:“人有个人性与公共性,这一直是矛盾着的,但最终是作为个人做出决断。”因此,即使在极限的状况下个人性胜利了,但如果认为这是这个人的“全部人格则是肤浅的”。^②也就是说,丧失了“公”的现代人,

① 参见:西尾幹二編『新しい歴史教科書』、扶桑社、2001年。

② 小林よしのり『新ゴーマニズム宣言 戦争論3』、幻冬舎、2003年、282頁。

是没有资格非议弃“私”而奉“公”的青年们的。

小林公开主张“公 = 国家”。国家独占了公共性，超越国家的“公”是完全超出想象的，不值一提。国民国家无疑是近代的产物，但在近代这个时代将要结束的时候，小林却在拼命彰显其存在理由。或许在世界变革的宏伟构想失去说服力的时候，人们应该依据的只有国民国家这一过于矮小的“现实”了。

按照小林自己的说法，《战争论》在 2002 年时卖了 70 万部，《战争论 2》卖了 40 万部。^① 与前一卷一样，《战争论 2》也基本上依据“编撰会”的论调，始终贯彻对战后思想进行批判、将大东亚战争正当化，以及坚持“慰安妇”与南京事件不过是由韩国、中国所进行的事实歪曲这样的主张。值得注意的是，《战争论 2》是从 2001 年的“9·11”恐怖袭击事件开始叙述的。小林在书中喊道“还有这么一招呢”，甚至自我表白“内心深处不禁喷发出了‘反美感情’，让我感到吃惊”。即宗教激进主义者的自杀恐怖袭击是对“暴露出大国自私的美国”的“主体性战争”，小林因此事自觉到了心中的反美意识。当然，小林的批判势必会指向日本的传统保守派，他痛斥亲美保守派：“给本·拉登提鞋都不配！”

小林的民族主义向反美的方向倾斜，在“编撰会”内部也引起很大冲击。“编撰会”主办过“《战争论 2》与‘9·11’恐怖袭击事件——日本是美国保护国吗”研讨会，在研讨会的记录中就反映了这种状况。例如，八木秀次就对小林的反美主义做了如下批判：“我认为思想与政治、外交应该分开来考虑。在思想上我也有过被反美的冲动所驱使的情况。但是，从政治上来讲反美不能成为选项。”^② 当然，八木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考虑到一旦因日本方面的反美导致美国改变立场的话，日本的安全保障就会陷入危机。

八木并没有自觉认识到，这样的政治上的方便主义，有可能从根本上动摇他们的民族主义。例如，在“慰安妇”问题上，“编撰会”对没有发现“强制”的实证资料却表明谢罪的“河野谈话”进行了激烈批

① 小林善纪「『戦争論 2』と 9・11 テロー日本はアメリカの保護国か—」、「正論」2002 年 4 月号。

② 同上书。

判，认为基于外交考虑的政治解决伤害了日本人的自尊心。但是，八木所说的思想与政治、外交相区别，明显地与“河野谈话”具有相同的结构。即八木按照对象来改变标准，对中国和韩国反对政治妥协，对美国则主张政治妥协。这是反映他们民族主义实质的东西。如果说民族主义的核心是国民自尊心的话，从占领时代到现在，经常伤害日本人自尊心的是美国。“编撰会”的民族主义，是将被美国伤害的自尊心转向了对社会主义以及对中国的批判。支配战后论坛的大多数知识界领袖是社会主义的同伴，源于对他们的怨恨以及对他们失去权威的轻蔑而批判社会主义，另一方面，批判中国、韩国则是源于因为这两个国家经济高速增长赶超日本而产生的焦躁感。

当然，保守阵营提出反美的民族主义，并不是从他们开始的。石原慎太郎、盛田昭夫的《日本可以说“不”》（1989年）就是其成功的例子。在这本合著中掌握主导权的是石原，其民族主义基于作为经济大国的自信（具体来说是日本在半导体等高科技领域的优势）。虽然石原的民族主义向反美的方向倾斜，但小林善纪的反美是重视在“大东亚战争”中与美国战斗过的历史事实，基于顽固的人种论观点，这是他们之间的根本差异。

忠实于自己心情的小林，相对于“编撰会”的政治考虑而言是自由的，所以突破了传统的保守民族主义。《战争论3》甚至批判以前一直主导保守（极右）民族主义的《产经新闻》和《正论》，骂其是“亲美小狗”。“激烈批判中国和朝鲜，但对美国却无条件支持的亲美保守态度——这仅仅是欺负弱者，经常追随强者的‘事大主义’，只是个小狗！”^①

小林善纪在《战争论3》第二章中，举出了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指责当即表示支持美国的小泉首相和保守知识分子是“没有胆识的窝囊废”。他认为，之所以支持没有联合国决议而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其原因是对朝鲜拥核的恐怖。即便日美同盟第一主义是日本外交的重点，但国民舆论支持小泉首相做出决定的原因，却是朝鲜的绑架人质问题与拥核的问题。但是，小林对此表示愤慨，认为出于自己的安全而背叛了曾与美国战斗过的祖父辈的心愿与大义是卑劣的。

① 小林よしのり『新ゴーマニズム宣言 戦争論3』、幻冬舎、2003年、193頁。

（四）安倍晋三的挫折

正如在本文的开头所讲过的那样，战后的统治精英们为了“维护国体”而与过去的敌人美国和解，放弃了成为民族主义的承担者，战后保守民族主义的困难就始于此。但 80 年代以后，由于中国、韩国的对日批判，其一时重新获得了生气。其主要的焦点是宪法、教育基本法、历史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等，这都是以占领统治和东京审判为出发点的。正如小林善纪所批判的那样，以历史教科书为契机出现的批判中国和韩国的民族主义，是以冷战的国际环境和安全保障为借口，封杀对美国进行批判的民族主义，具有极为不正常的性质。从 2001 年到 2007 年出现的小泉、安倍两届内阁，也顺应这样的民族主义风潮，特别注意将朝鲜的因素作为政治资源来煽动保守舆论。值得注意的是，其获得了广泛的支持。在支持安倍晋三的年轻自民党议员的核心中，70 年代青岚会成员的后代引人注目，这象征着 30 年来日本政治的结构变化。但是，战后日本的民族主义潜伏着反美的契机，所以以民族主义为资源的政治，不得不在与日美同盟第一主义的外交方针之间走钢丝。如果先说结论的话，那就是安倍晋三并没能很好地走完这一段。

安倍在就任首相之前出版的《致美丽的祖国》，象征着安倍周围的政治气氛。甜美的面孔、有点短舌头的发音、男孩子式的风貌等，安倍所酿出的氛围确实与“美”这一形容词相吻合。但是，该书的内容却与这样的甜美表现性质不一样。在开卷的第一页，他将自己称为“战斗的政治家”，宣示其战斗性。关于外交方针，也根据共同拥有“自由、民主主义、基本的人权、法律的支配”等价值观，提倡构筑与印度、澳大利亚、美国的紧密关系。在首次就职演说（2006 年 9 月）中，他从四个方面来说明“美丽的祖国”，最初的两点为重视“文化、传统、自然、历史”，以“自由的社会”为根本但又重视纪律的“凛然的国家”。修改宪法自不用说，安倍所谓的“美丽的祖国”与其情绪性的形容词不同，内容是极为意识形态化的。

安倍于 1997 年就任以年轻议员为中心成立的“思考日本的前途与历史教育青年议员之会”的事务局长，而且由于在绑架问题上作为强硬派领导显露头角，作为小泉内阁的官房长官和自民党干事长频繁在媒体露面，因此尽管只有当选五次议员这样短的政治经历仍被推上了首相

的座位。由于绑架问题使舆论向强硬的民族主义倾斜，安倍的态度获得了舆论的高度支持。但是，他在朝鲜问题上所持的绑架问题优先于核问题的态度，从一开始就包含着日本在六方会谈（美俄中韩日与朝鲜）中被孤立的危险性。另外，在绑架问题上舆论激愤的结果是，限制了选择出外交牌而束缚了自己的手脚，使得与优先处理核问题的四个国家的协调变得困难起来。

以“编撰会”为中心的民族主义者欢迎安倍内阁诞生。但是，就是在这方面，安倍的处境也很微妙。由于小泉前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使日本与中国、韩国的关系处于最坏的状态，安倍的外交课题是首先改善与两国的关系。其前提是再次确认“河野谈话”与“村山谈话”的有效性。处于担负责任立场的安倍虽然宣布继承两个谈话，但这使热心支持他的民族主义者们失望了。他在国会的答辩中否认对“慰安妇”的“强制”，出现了与“河野谈话”的整合性问题，其暧昧姿态在《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上也受到批判，美国与加拿大议会还通过了对日本要求谢罪的决议。“慰安妇”问题在英语中表达为“sex slavery”，安倍不明确谢罪的态度，只能引起国际社会的负面评价。

在东京审判中对甲级战犯的判决与明确记载接受其判决的《旧金山和约》第11条之间的关联上，也产生了类似的问题。安倍举出甲级战犯贺屋兴宣与重光葵的复出，解释说其后在国内法上决定不将战犯作为犯罪者来对待，主张参拜靖国神社与该条约并不抵触。^①但是，对除了上述两人以外的甲级战犯，事实上在国内法上并没有办理恢复名誉的手续，所以也可以解释为由于接受了和约，日本现在也承认甲级战犯。虽然采取什么立场都是可能的，但问题是无视和约第11条与日美同盟第一主义是难以两立的。实际上，在成为首相之后，安倍举出了和约第11条，再次确认接受了东京审判。

支持安倍的国内势力，对这样的后退感到失望，认为“安倍首相已经不是安倍晋三”，结果是对安倍的抛弃。2007年9月安倍突然辞职，虽然直接原因是参议院选举失败的影响，但事态的本质却在于安倍的处境本身。安倍所依靠的右翼民族主义是国内消费用的，难以在国际

① 安倍晋三『美しい国へ』、文藝春秋社、2006年、69頁以下。

上通行。其结果，他对国内与国外分别使用两张面孔，加深了矛盾。

三 结 语

从 20 世纪 60 年代到现在，时间过了约半个世纪。日本由经济增长成为发达国家，成为给世界经济以重大影响的“大国”。日本经济的变化与市场经济支配世界是一体的，80 年代以后，世界迅速地形成了一个市场圈，这意味着金钱、物资、人员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跨越国境流动。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指出，异质文明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接触，成为冷战后纷争的根本原因。在 80 年代，移民问题成为西欧发达国家的深刻问题，主张排斥移民的极右势力已经开始抬头。可以说，亨廷顿将其扩大到全世界，洞察到由于冷战的终结，过去历史的深层开始暴露出来。虽然亨廷顿的预言不能说全是正确的，但由全球化带来的世界经济一体化，确实在世界各地迅速形成了民族主义，在一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被称做“民族净化”的悲惨事态。

在迅速形成民族主义这一点上，日本也不例外。政治不能确切应对经济和社会变化的状况，是发达国家的共同现象，但在日本是以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的。高速增长以后的日本政治，其特征是由族议员所象征的权利政治的结构化、由小泉首相所代表的政治剧场化，以及庞大的“无党派层”年轻人与城市中间层的存在。“无党派层”是远离既存权力政治的各类人群，成为中曾根康弘与小泉纯一郎的大众迎合主义手法的目标。

停留于国民国家水平的政治，已经无法控制全球化以后以世界规模联动的经济，无论在哪里都潜藏着民族主义的熔岩。21 世纪的日本政治为前所未有的闭塞感所笼罩。小泉内阁以超群的大众迎合主义手法与对朝鲜等的强硬姿态，一时迷惑了国民，淡化了他们的不满与不安，但这反而暴露了小泉后自民党内阁的无能，导致了政权交替。但是，民主党内阁被剧场化的政治环境拖了后腿，在各个方面暴露出了不成熟，由于对其期待很大反而给国民带来了更大的闭塞感。进而，民主党内阁的支持率低下，又为桥下彻（大阪市长）、河村隆之（名古屋市长）等大众迎合主义者，以及石原慎太郎、安倍晋三等右翼政治家，提供了绝好的活动舞台。

（责任编辑：李璇夏）

論文要約

戦後日本経済の発展段階に関する考察 — キャッチアップ経済の構造的欠陥を兼ねて —

徐 平

先進工業国と比較すれば、日本は後進国に属し、その経済発展モデルは、キャッチアップ経済に属する。この視点から見れば、戦後日本経済のキャッチアップは、キャッチアップ「実験」、バブル「実験」と方向転換「実験」という三段階を経てきたと考えられる。三段階における日本のキャッチアップ経済の実績が異なる。キャッチアップ段階では目覚ましい実績をあげ、バブル段階では弊害を露呈し、方向転換段階では経済が停滞した。日本のキャッチアップ経済のプロセスを三段階に分けて入念に検討した結果、キャッチアップ経済に乗り超え難い構造的欠陥が存在することがわかった。それこそ、日本経済の方向転換における制度革新のボトルネックになっている。日本のキャッチアップ経済のプロセスは、政府の関与が経済成長の鍵にもなったし、経済不況の根源にもなったという結果を例示することになった。

現代日本のナショナリズム

米原 謙 崔 世広 [訳]

1970年代末から、日本のナショナリズムは、敗戦や対米従属というコンプレックスから解放されて、「現代」的な形態をとるようになった。1980年代は、日本のナショナリズムが「戦後」の拘束から解放されて、経済成長という国家目標と、「経済大国」に相応する「貢献」を要求する国際的な圧力とのギャップが争点になった時期である。冷戦終結後、冷戦によって封印されていた「歴史問題」が「戦後補償」問題として噴出した。日本の政治家も知識人も従来この種の問題に直面するのは稀だったので、東アジア諸国から厳しい批判を受けた。一方、慰安婦問題などを契機に「謝罪」問題がクローズアップされると、逆にこれに反発する右派ジャーナリズムが勃興し、戦後日本が経験したことのない激しいナショナリズムが民衆レベルで浮上し、石原慎太郎や安倍晋三に代表される極右の政治家が大衆的な支持を得る現象が起こっている。

経済の角度から見る中日関係

徐 梅

2012年9月10日に、日本政府は、釣魚島を国有化することを宣言したことにより、中日